

編後絮語

■ 韓思藝

本刊副總編輯

二零二零年元旦剛過，本人就非常榮幸地加入了《文化中國》的編輯團隊，負責總二零二期的策劃編輯工作。正當我們緊鑼密鼓地開始策劃欄目、設計編輯之時，新冠疫情突發而至，且愈演愈烈，呈席捲全球之勢。我們的幾位編輯都是在家隔離中各自展開工作，主編梁博士更是輾轉於北美與香港多地，積極展開與疫情相關的社會慈善與救助工作，他還特地邀請旅居加拿大的社會學家蘇紅為我們撰寫了「卷首論語」。蘇紅從「風險社會」的角度指出，全球性的風險創造了一個「共同世界」，這需要我們以超越國家邊界和民族衝突的視角來看待「風險」。在共同應對風險的實踐中，我們需要改造舊有的制度，創建新制度，努力開拓國際化視野，建立跨國網絡。無論是政府還是組織，抑或是個體，都應該跳出地域、國家、種族的框架，具備全球視野和姿態，以應對全球風險。

在「全球風險」的時代，我們不僅躲避各種風險可能給我們帶來的傷害，還需要洞悉並積極應對「全球風險」給中國乃至整個世界帶來的深刻變革。這需要我們在中西文化之間的互相激蕩與互相對話中，不僅學習和借鑒西方的先進經驗，也在中國文化的傳統中尋找思想資源，來處理「全球風險」問題。本期《文化中國》一如既往地中西文化的對話與交流的大背景下，探討一些具體問題。梁燕城指出，從在實踐中把握歷史發展的大勢與天理的王船山，到將道德實踐轉向革命實踐的孫中山，再到以中國文化吸收馬克思主義並將之中國化，以尋求中國自強自救的毛澤東的發展歷程，實踐哲學成為中國社會近現代發展的精神脈絡。我們認為，這種在實踐中求真知的精神，同樣可以為應對「全球風險」提供中國智慧。黑龍江大學的李安澤認為，成中英對於中西人文價值和科學知識的平衡互動、整體相生的思考，將科學、人文與宗教納入一個機體統一的世界文化體系，有助於解決當代世界文化中突出的科學與人文的衝突以及學科之間的張力。

在這場疫情當中，東西方關於是否應該戴口罩的問題都有很多爭論。對於這個問題，除了在醫學層面的討論之外，在道德倫理層面也可展開討論，以增進彼此的理解。在東西方交往密切的全球化時代，價值觀念的跨文化理解，對全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起著十分重要作用。譬如，源自中國的「謙虛」價值觀念在西方心理學領域就經歷了發現、爭論、理解和誤解的過程。武漢大學的單波、張露黎指出，只有文化心理學派的學者們達到了進入東方文化傳統的程度，才可能在對語詞的討論之中進行理解。筆者看來，疫情當中，自覺保持戴口罩的行動背後，是東方人謙讓自斂個性和品格的表現。近代以來，相對於西方對於東方的「謙虛」價值的發現，中國對於西方價值的引進更是革命性的。上海社科院的程偉禮探討了中西方道德文化之間的爭論對於推進中國文化的創新發展的積極作用。他明確指出，中國傳統文化應當克服血緣政治或利益共同體的局限性，放棄陳舊的社會等級與倫理等級秩序，使中國文化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社會危機不僅拷問著我們的文化傳統，考驗著我們的價值倫理，也在考核我們的社會治理能力。蘭州交通大學的謝亮以近代西北賑災為例，指出統治階級力量是否制度化地融入國家體制，將極大影響國家體制、生產方式、文化傳統間能否形成互動性的支撐結構。武漢大學的廖奕則認為，面向未來的法律理論，可以通過新的文學法理學等法文化研究進路，在多重非均衡及硬約束的分析框架下，闡釋社會矛盾的發生和演變機理，在大轉型和後轉型時代尋找彌合紛爭的法治要道。

新冠疫情還在大地之上徘徊，好事者甚至為我們今後的日子造出一個嶄新的名字——「後疫情時代」。全球風險與危機意識相互激蕩，仁人志士必會坐而論道，起而力行，為文化中國添磚加瓦。《文化中國》同仁願與諸君同行！